

【思想文化研究】

试析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传统”理论

刘 凯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传统”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他针对自文艺复兴以来崇尚理性和否定权威、传统的现象,重新诠释了“传统”、“权威”。他通过对理性与传统的关系、前见的合法性、理解的历史性等的分析,在“理性法庭”的废墟上营建了新的“传统”的理论。

关键词:传统;权威;理性;前见;理解的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 04-0015-03

On the Theory “Tradition” in the Book of “Truth and Method” by Gadamer

LIU Ka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Middle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Gadamer’s hermeneutics. Gadamer renotes the concepts of “Tradition” and “authority” and develops the new theory of “Tradition” in the ruins of reason court through analys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tradition, and advanced legality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tradition; authority; reason; forese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文艺复兴以后,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欧洲哲学在新的阳光下,高高擎起时代的理性大旗,似乎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自己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崇拜,几乎到了把理性无限肯定到与真理、权威三者合一的程度。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站在启蒙运动的对立面,竭力维护旧的历史传统和权威。伽达默尔步其后尘,对“传统”、“权威”重新诠释,为其正名。

一、权威和传统的新诠释

启蒙运动反对教会权威、盲目崇拜和信仰,主张理性和科学。伽达默尔对启蒙运动的这种思想态度作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他承认如果权威的声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的话,权威可能成为偏见的源泉;但另一方面,他提出不能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

理源泉的可能性,而启蒙运动忽略这方面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启蒙运动在诋毁一切权威的时候,实际上是歪曲了权威的概念,把权威仅仅限制在“盲目地服从”这一意义上。他说:“事实上,诋毁一切权威不只是启蒙运动本身所确立的偏见,而且这种诋毁也导致权威概念被曲解。因为根据启蒙运动所赋予理性和自由概念的意义,权威概念可以被看作为与理性和自由正好相对立的概念,即意味着盲目地服从”^[2]。

伽达默尔认为,“盲目地服从”并不是权威的真正本质,权威和理性并不是处于一种对立关系中;恰恰相反,权威的本质正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活动,这就是对他人判断优先发生的一种理性认同。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认为,这种被正确理解的权威概念与盲目服从毫无联系,而只与认识相关联。在他看来,权威之所以能够对人发号施令,使人服从它,其

原因并不在于命令本身,而在于使这种命令有效的权威本身所具有的现实合理性,它本身也是以一种自由和理性的行动为基础的。伽达默尔举例说,上级之所以权威,其原因在于上级往往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或具备更多的信息;换句话讲,上级具有更为完善的认识。启蒙运动以理性决定一切,标榜自己不接受任何权威,但事实上它接受了另一种权威——理性的权威。

传统和理性的对立这一观点也提出了批评。他的分析是从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反对入手的。他指出,虽然浪漫主义承认传统是历史上被给予的东西,人不可能摆脱传统,从而给传统保留了存在的权利。但是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价值标准的颠倒,并不意味着它与启蒙运动的彻底决裂,相反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传统和理性的对立。伽达默尔说“浪漫主义把传统视为理性自由的对立面,并且认为传统是历史上被给予的东西,有如自然一样。不管我们是想以革命的方式反对传统还是保留传统,传统仍被视为自由的自我规定的抽象对立面……”^[2]。伽达默尔认为,浪漫主义坚持传统和理性的绝对对立,同样是一种启蒙运动式的偏见。

伽达默尔指出,这种对传统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则“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2]。不仅如此,传统也不是浪漫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象自然一样历史给予的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本身也是一种理性活动的结果。对此,伽达默尔说:“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表现为理性的唯一活动和行动。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无论如何,保存与破坏和更新的行为一样,是一种自由的行动”^[2]。

二、前见的合法性和理解的历史性

“前见”这个概念和权威、传统两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伽达默尔对传统和权威的意义作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他的“前见”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活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总以某种“前结构”、“前把握”为出发点,这就是传统中所保留的见解,它是一种在我们的判断之前的判断,即“前判断”或“前见”。

伽达默尔认为,“前见”这个概念并没有现在的那种否定的意义。它原是一法学词汇,指在法庭上对诉讼对象所作的一种先于正式法律判决前的临时判决或初判决。这种初判决是可以被更改或撤销的,但是在最后的正式法律判决确定之前,它是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与合法性的。这种初判决对于诉讼对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伽达默尔认为,“前见”在这里所具有的“损害、不利、损失”仅仅是一种“结果上的否定性”,而这种否定性恰恰是建立在“前见”作为一种肯定的有效判断基础之上的。所以伽达默尔指出:“‘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价值”^[2]。只是由于启蒙运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前见”才被贬低为只具有“虚妄的判断”这种意思。

启蒙运动之所以认为“前见”是“虚妄的判断”,是因为它认为的前见源于权威。伽达默尔认为,一切权威的最终根源是理性。事实上,权威不能由他人授予,只能凭知识获得。它构成了“理解的视界”,表明了传统所规定的理解活动的趋向,是形成新的理解、新传统的根据,因而是“诠释学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人的本质内容。这样,伽达默尔不仅给“前见”和“传统”正名,而且将它们安置在人的本质内容之中,从而彻底保证了“传统”、“前见”在认识活动中的合法地位。他反对一味排斥“前见”,主张要分清什么是合理的前见,什么是错误的前见。合理的前见是合法的,那么对于前见所构成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也就不应一概拒之门外。否则不仅不能把握人的理解活动的机制,而且也否定了人的存在和理解活动的历史性,否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伽达默尔所谓的前见,也就是海德格尔的理解的结构,它是传统制约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因素。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都有自己无法意识到的前见——许多指导人们在一定情境下如何行事的预想和观念。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那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带着没有反思过的观念去理解。既然没有前见理解就不能发生,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们本质的价值,“一个不承认他为前见所支配的人,将看不到前见的光芒所显示的东西”^[2]。没有这种前理解就不可能达到对本文结构的完满理解。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的前理解结构就是一种“合法的前见”。人永远处在这种“前见”

之中,不可能摆脱“前见”。

在伽达默尔看来,前见是制约人们和理解的历史性范畴。理解的历史性范畴是伽达默尔传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与古典诠释学和启蒙运动的根本分歧之一。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本文的理解。古典诠释学认为,诠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主观前见和误解,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的真实,即把握作者或本文的原意;历史性是应予克服的主观的偶然性因素。

伽达默尔认为,和文本的作者一样,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的,他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都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否定读者的历史性。他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本文与作者,都内在地嵌入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视界,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只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总之,理解的历史性具体地表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启蒙运动反对传统和前见,而狄尔泰代表的19世纪“精神科学”则追求自然科学那种按照一个规则体系和方法论原则得到客观的知识,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的主张失去了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其实,即使是最无倾向性地运用科学方法,但在选题、提出问题、知识兴趣等方面,仍有传统的因素起作用。

知识和理性并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在它们之外还有历史性因素制约和决定它们,但这种作用常被忽略。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惊人,人们天真地想像理性和科学与真理等同起来,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泛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启蒙运动赋予了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愚昧、迷信、盲目崇拜,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超历史的理性、永恒的绝对的理性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学也不在历史之外,任何科学的概念、方法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应历史地加以理解。

传统之所以是必需的,还在于“人是一个具有语言的存在”。一切理解与解释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语言仅仅是理解的工具。语言其实

质是“储蓄传统的水库”,是人们的 world 观念,其本身就是传统。传统不能脱离当代独立存在,凡是被今天称之为传统的东西,正是今天我们能从语言中意识到的过去,在使用语言发生理解的时刻,过去就有了生命。人置身于传统之中却常说觉察不到它,是因为人与语言水乳交融。人在语言中不自觉地成为历史与传统的一部分,又在语言中不自觉地延续着传统。

伽达默尔所讲的传统、前见、历史性都是为论证积极的理解服务的。传统和前见是理解服务的必要前提和开放的基础。伽达默尔指出,正是传统才调动了解释者的前见,构成了“理解的视域”,形成新理解、新传统的根据。理解既以前见为基础,又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调整和修改前见,包括剔除在理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错误前见,同时产生新的前见,在此之上形成新的理解。但这种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传统就这样发展着。只要我们理解着就参与了传统的进化,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在前见面前,心灵可以改变和剔除某些先见,尤其是自后天的经验而来的先见,拓展着理解向无限未知世界的开放。

三、一点体会

伽达默尔对传统、权威、前见、历史性的洞见,让人耳目一新,也丰富和深化了哲学诠释学理论。但是他的理论只代表了一种“视域”,因为他的视域不可能包罗万象、完善无缺。他对启蒙运动的分析也有某种片面性。他用历史的分析方法批判启蒙运动没有从历史的高度理解前见和权威,进而全盘否定启蒙运动对前见和权威的批判。但这表明他并没有真正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启蒙运动对前见和权威批判中的积极作用,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环境评价历史,不结合特定历史背景而抽象地谈权威的合理性,这样就将启蒙运动反对权威的历史意义完全抹杀了。看到权威的一定的合理性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往往使人走向保守主义。我们应警惕可能出现的“彻底反传统”与“全面复活传统”两种倾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2]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